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TUDIES ABROAD: A COLLECTION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uring the Sino-US Confrontation (1949-1972)

隔绝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 (1949—1972)



吴原元◎著

隔绝对峙时期的 美国中国学 (1949—1972)

◎

吴原元 著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uring the
Sino-US Confrontation (1949-1972)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隔绝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1949—1972)/吴原元著.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12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朱政惠主编)

ISBN 978 - 7 - 5326 - 2584 - 0

I. 隔... II. 吴... III. 汉学—研究—美国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2884 号

责任编辑 刘大立 冯 一

装帧设计 汪 溪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
隔绝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
(1949—1972)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 ewen. cc www. cishu. com. cn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5 插页 1 字数 253 000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2584 - 0/K · 575

定价: 3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36162648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序

目前,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正积极开展起来,如何使对它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并跨入真正的学科建设,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认为,对国际汉学的研究,“应当采用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将汉学的递嬗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和其他种种学科一样,汉学也受着各时代思潮的推动、制约,不了解这些思潮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便无法充分认识汉学不同流派的特点和意义”(《〈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序》,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这一学术主张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

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起步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当时开始这一研究,主要是为了深入对中国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而这些不同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近现代史学流派,都受到海外史学思想和史学思潮的很大影响,因此必须从史学的国际交流及其互动的视角去观察和认识。在此过程中,比较文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探讨的兴起,曾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使我们对本土史学的研究延伸到对海外中国史学的比较研究,并拓展到对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发展史的探讨。在此研究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学科基础和方法论的重要指导作用。根据其学科理论和基本方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海外的中国学家、中国学著作、中国学机构,以及与其相关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编纂理念,通过对其历史原貌及其学术流变的考察,探究其学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总结出有益于我们学科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以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十分重视与对象国历史及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联系考察,注意对象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及重大国际事件的联系考察,关心国际学术思潮与对象国学术思潮的互动关系等。所以从这点上说,我们很赞同李学勤教授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学术史、思想史、史学史,其研究取向与研究

方法有很大的相通性。

海外中国学包容宽泛的特点,决定了任何一个学科不能单独穷尽其研究,所以对它的探讨,必须有历史学、文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的联合攻关。如果每个学科都能根据自己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深入对其相关领域的探讨,那么,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就有可能在整体上获得重要突破。

我们之所以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介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不只是因为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时间较长,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很多国家的汉学、中国学缘起及其主要成就,都相对集中于对中国历史等人文问题的探讨。在美国,无论是20世纪上半叶的汉学还是“二战”后的现代中国学形成,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一直比较集中于历史及传统文化的探讨,尔后社会科学逐步介入,转入跨学科、多学科的发展态势。所以从历史学突破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一种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尊重,也是针对性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必要手段。诚然,由于越来越多的学科介入中国问题的探讨,所以对研究者来说,仅仅从一个学科来把握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不够的,只有跨学科的视野和多学科的渊博学识才有可能应对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研究局势和研究对象。

中国的崛起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兴盛,使这一探索工作更具魅力而富有意义,这也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但总的说,这项工作还属于起步的阶段。目前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翻译丛书已有不少,各家都有自己的用心和重点。参考诸家丛书发展特色,本丛书将把重点放在对海外中国学发展史的探讨上,包括对象国汉学史、中国学发展史的梳理、回顾和总结,一些重要汉学家、中国学家、中国学机构成就的探析和解读;当然,为了了解当前国际汉学发展前沿与思潮动态,也将重点翻译和推出一些重要汉学家、中国学家的学术名著,包括国内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相关重要学术成果。为后人留存史料、保持珍贵历史记忆以及对学术前沿的探索,将是我们这套丛书的重要使命,为此,我们还将努力推出一些自己的原创性成果。研究和批判人家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本民族文化的建设和繁荣。

三十年改革开放重新点燃了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不熄热情,衷心期望我们的努力成为通往成功之径的小小铺路石。

编者

2008年3月

目 录

导 言	1
一、选题旨意	1
二、学术史回顾	4
三、研究思路	11
第一章 中美对峙前的美国中国学	17
一、1949 年之前的中国研究	17
二、1949 年之前的中国知识教育	22
第二章 麦卡锡阴影下的美国中国学	40
一、现当代中国研究趋于沉寂	41
二、中共党史研究的异化	46
三、儒家思想研究受关注	56
第三章 国防教育法与中国学建设的跃进	79
一、国防教育法及其影响	79
二、中国知识教育的拓展	86
三、中国研究机构的兴建	92

第四章 建设热中的美国中国学家	108
一、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	108
二、积极为政府出谋划策	112
三、增进公众对中国的了解	120
第五章 对峙时期中国研究之特点	133
一、社会科学介入中国学	134
二、“现代化论”的盛行	143
第六章 走出对峙状态的美国中国学	159
一、美国中国学发展的新契机	159
二、华裔学者的研究及影响	166
三、中国研究的新趋向	173
结 语	197
参考书目	205
后 记	231

导 言

一、选题旨意

1949年至1972年,正是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冷战阴霾笼罩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时代。因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及其他问题,中美在意识形态、政治及军事上处于尖锐对峙状态。与此同时,1949年至1972年亦是美国中国学形成确立的时期。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等一批闻名遐迩的中国研究机构即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注重近现代中国研究、注重吸收借鉴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风格以及美国中国学的基本格局亦形成于这一时期。以中美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作为探讨对象,显而易见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1958年至1970年,联邦政府、基金会、高校共投入大约53 000 000美元用于资助中国研究。^[1]巨额资金的投入使得这一时期的美国中国学在机构设置、人员培养、著作出版、图书资料建设以及中国知识教育开展等方面取得了跃进式大发展。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巨额资金的投入并没有产生相应高水平的学术研究。这一时期从事近代中国研究的美国本土学者中很少有人既能轻松阅读不同类型的汉语著作又能说流利汉语。1973年,以599位中国学家为样本调查发现,只有25%的人完全具备汉语能力,40%能够阅读,34%具备较流利的口语能力,9%的人能够用汉语写作。^[2]林德贝克(John M. H. Lindbeck)曾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的汉语水平如是评价:“没有一个非华裔的美国学者真正精通双语;全美仅有不超过二到三人能够用汉语写出适于刊载在中文期刊上的文章。”^[3]

美国中国研究专业学者的中文能力问题,暴露了美国中国学根本性弱点。如

果不能读原典,那么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历史究竟能深入到什么程度?在研究方面,究竟有多少独立的能力?不可否认,中美对峙时期美国中国学界出版了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芮玛丽(Mary Wright)的《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的《大门口的陌生人》、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的《中国早期工业化》、孔飞力(Philip Kuhn)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珀金斯(Dwight Perkins)的《中国农业的发展》等一批颇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但总体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国研究的学术水准多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在于中文能力之不足。为此,美国中国学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得不依赖中国研究生、各地中国的研究合作人或姻亲关系的帮助。更为严重的是,许多中国学家受中文能力和中国文史知识的限制,却又想在学坛立足和扬名,为此他们往往有取巧的心理。萧公权曾对美国的对中国历史研究如是描述:各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不愿(或不能)广参细考中文书籍,但又必须时时发表著作,以便维持或增进他们的声誉,或博取升级加薪的待遇。天资高一点的会从涉猎过的一些资料中“断章取义”,挑出“论题”,大做文章。只要论题新鲜,行文流畅,纵然是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的产品,也会有人赞赏,作者也沾沾自喜。这种作风竟有点像王阳明在《书石中卷》中所说:“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4]缘于此,他们研究的深度和准确性不可避免地令人生疑,甚至可说是谬误百出。^[5]林德贝克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曾尖锐地批评道,“有关近现代中国的大多数研究著作是肤浅的”^[6];芮玛丽曾就美国的辛亥革命研究如此反省,“面对着这些新发现罗列出来的例证,一开头不免有点吃惊,过后又热情满怀,信心十足。原来我们过去在课堂上讲、在教科书上写的关于20世纪初中国的画像,几乎全部是错了的”。^[7]正因为中国研究的知识水准存在严重问题,所以林德贝克在20世纪60年代末明确提出,“下一个十年中要深入的理解中国,主要依赖的不是教育和研究的数量,而是提高质量”^[8];1973年11月召开的“关于优先考虑中国学研究的筹资和发展”会议上,来自美国各地的中国学家都普遍认为,“目前,无论是传统的或当代的中国研究,有关研究生的训练及其研究,必须重视质量甚于数量”;“当前我们所要关心的是传统和当代研究的学术知识水平,而不是竞相取得对传统和当代研究的资助”。^[9]在雄厚财政资助下,美国中国学家的学术能力及其研究水平为什么没有相应提升?对中美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进行系统探讨,我们不仅可以找寻到其中的答案,还有助于思考外部资

助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这将为繁荣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有益借鉴。

此外,系统探讨中美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研究,亦有助于丰富深化我们对中美关系史的认识。在中美隔绝对峙时期,美国中国学家中有相当一批人在指导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参与对广大公众的政策阐释工作。例如,20世纪50年代末曾委托鲍大可(A. Doak Barnett)进行有关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对外关系理事会,此时主办了雄心勃勃的系列讲座“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知名中国学家登台向高层社会人士解释有关中国对外政策的问题。1966年,鲍大可联合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卢西恩·派伊(Lucian Pye)、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以及其他权威中国问题专家,组建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处理台湾问题作了展望式的研究。显然,如果对这一时期的美国中国学进行探讨,我们便可从中窥探到中国学家是如何看待共产主义中国、对中美关系持何种观点、如何影响美国政府和民众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以及中美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学家影响,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美关系如何从冲突对峙走向缓和的内在变化过程,拓展我们对中美关系认识的视阈。

从学术角度而言,系统考察中美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有助于深化对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的认识。众所周知,各国、各地区的中国学除了受时代思潮的推动和制约之外,还受所在国与中国关系的影响。1973年,以599位中国问题专家和452位研究生为样本进行的调查中发现,曾居住在中国或到过中国旅行的中国学家,他们的汉语水平明显高于那些缺乏中国经历的人,被调查的中国问题专家和研究生一致认为提高汉语水平的主要障碍在于缺乏到中国去的机会,缺乏使用汉语的环境^[10]。富路特(Luther C. Goodrich)曾就中美对峙状态给美国中国学所造成的影响言简意赅地指出:“一整代青年学者从来没有去过北京、参观过长安、到长江黄河旅行过或者登越过泰山或看过敦煌和龙门的佛教浮雕。缺乏这些知识背景的年轻中国学家,当他们阅读中国文献时如何能够理解文献记载的真实含义?是的,亚瑟·韦利(Arthur Waley)^[11]确实没有到过中国,但世界上能有几个像亚瑟·韦利这样的人?”^[12]很显然,通过对中美对峙时期美国中国学的探讨,我们可知晓这一时期中国研究在多大程度受到中美隔绝对峙的影响。再者,如果将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中国学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美国中国学作比较,我们可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具体而言: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前者以传统中国的历史、语言、文化、思想为研究重点,后者则转为以近现代中国研究为主;在研究方法方面,前者多采用考古学、语言学、考据学等实证方法,后者则注意采

用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之理论方法;在研究观念方面,前者多持有西方中心论之观念,以西方的社会进程反观中国社会,后者虽仍带有西方中心论的影子,但已开始将研究观察点立于中国,以中国为中心考察中国社会历史之发展。显而易见,美国中国学在中美对峙时期发生了巨大转变。如果不对1949年至1972年间的美国中国学进行探讨,我们将无法理解美国中国学何以会出现如此巨大转变,由此也就不可能准确把握美国中国学发展演变的内在轨迹。

二、学术史回顾

美国中国学家非常重视对自身工作的总结和反思。近百年来,他们撰写了诸多有关这方面的论著。^[13]在这些著述中,1949年至1972年的中国研究是重中之重。美国中国学家对于中国研究的总结与反思,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概述中国研究状况。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tourette)的《美国的远东研究:回顾与展望》(《远东季刊》1955年11月号),结合亲身经历全面回顾了美国远东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对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远东研究的进展作了简要介绍和展望;费正清的《歧义未定:美国的亚洲研究》(《亚洲研究》1959年11月号),回顾了美国亚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对当前美国亚洲研究学界存在注重传统研究、语言能力不足、浮躁之风等问题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今后亚洲研究者一方面应注意提高语言能力,建议将汉语和其他亚洲语言纳入到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另一方面,建议亚洲研究者抛弃“人文学科”,或者称之为“反科学”、“前科学”术语的束缚,在研究其他国家时尝试采用“人文科学(humanistic sciences)”;富路特的《中国研究的最近发展》(《美国东方学会杂志》1965年6月号),介绍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及美国的中国研究发展状况,分析了当前中国研究存在的问题:缺乏与中国本土学者的交流、年轻中国学家缺乏亲身体验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等;芮沃寿(Arthur F. Wright)的《今日的中国研究》(《亚洲研究通讯》1965年2月号),则对美国中国研究偏向当代中国研究、学术研究质量下降等问题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黄宗智教授的《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对战后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作了总体性的介绍。他将战后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及其学者群体划分为三个阶段:费正清、列文森、芮玛丽、史华慈为代表的第一代,这一代的研究

重点是官方史和人物思想传记;以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珀金斯、孔飞力为代表的第二代,这一代注意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可称之为结合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第三代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毕业的研究生,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反帝史、经济史、民众运动史和地方史。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刘广京教授的《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趋势》(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认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西潮冲击论”、“历史遗产论”、“传统障碍论”、“内在动力论”、“民族觉醒论”等模式,他对这些理论模式的代表性成果作了细腻的介绍分析。《理解中国:对美国学术资料的评估》(1971),是林德贝克对美国中国研究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的结果。很可惜,他还没来得及对调查得来的数据、资料进行思考就因病去世。这本著作的内容主要是介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国学在汉语言训练、研究机构、人才培养、社会科学介入中国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同时,他还就中国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中国学发展前景以及如何推进中国研究作了探讨,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客观而言,这本著作最为重要的价值在于提供了有关这一时期美国中国研究机构建设、资金来源、汉语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数据。

其二,检讨中国研究的方法、概念及范式。斯坦福大学的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和马若孟(Ramon H. Myers)于1980年在《华盛顿季刊》上发表了《汉学的阴影:美国的近代中国问题研究状况》一文,该文系统检讨反思了二战以来美国中国学界在研究1949年之前和1949年之后中国历史时所普遍使用的“革命”术语以及在研究共产主义中国时使用的“现代化”术语,作者认为“革命”和“现代化”这两个术语都存在意识形态化倾向,严重阻碍对中国的深入理解。作者指出,中国学家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应从这两个概念中超脱出来,寻求其他社会科学方法,同时应注意传统中国研究与以社会科学方法主导的现代中国研究的融合。1983年,埃米·威尔逊(Amy A. Wilson)和理查德·威尔逊(Richard W. Wilson)合作主编的《中国研究领域中的方法论问题》一书出版^[14]。该书主要是就二战以来美国中国学研究著作当中所应用的方法、模式,特别是美国中国研究在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他们认为,区域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被看成是二等公民,区域研究专家则一般被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主流看作是边缘性的研究。以研究西方发达社会为根基、具有一整套成熟概念、理论框架以及模型的社会科学主流指引着这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区域研究专家们的工作。处于边缘地位的区域研究专家们所承担的任务,只不过是主流社会科学家们已经创设好

的理论方法架构之下为其提供数据,完成一些边角性的工作;他们强调,学术界需对社会科学模式与区域研究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因为使用社会科学中流行的模式能拓展对中国的理解,从中国这一个案研究中得到的材料和研究结果亦能纠正或修补当前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方法,至少表明以前被人们广为接受的理论方法应作修正。1984年,柯文(Paul A.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出版,该书较为全面地回顾了自费正清奠定现代中国学以来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方法、成果与趋向,系统批判了战后主导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冲击与反应”、“传统与现代”、“帝国主义”三种理论模式,认为这三种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他指出,要全面深入的认识中国近代史,学者应采取“中国中心观”这一研究取向。对于“中国中心观”的内涵,柯文在书中作了具体阐述。在柯文看来,“中国中心观”主要是指:(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上,以展开区域性和地方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学科,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1986年,马若孟和台湾学者戴春国合作主编《理解共产主义中国:美国和中华民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研究,1949—1978》一书。该书对于美国学者在研究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共产主义中国所采用的“共产主义者的集权专制主义”(Communist-totalitarian)、“现代化进程中的共产主义政权”(the Modernizing Communist Regime)、“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权”(the Revolutionary - Socialist Regime)、“中国式的共产主义政权”(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这四种描述类型的内涵、准确性和利弊进行了具体分析。

其三,反思中国研究与政府、基金会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不少学者就中国研究与政府、基金会等外部机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检讨与反思。莫斯·罗伯茨(Moss Roberts)、戴维·霍罗威茨(David Horowitz)、朱迪斯·科伯恩(Judith Coburn)等“关心亚洲委员会”的成员撰文认为,二战后的中国研究是由联邦政府、基金会等外部机构所控制,其研究是为政府的政策服务,是政府的实用工具。^[15]1997年,关心亚洲委员会在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等人组织下召开了“亚洲、亚洲研究与国家安全”研讨会,专门讨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亚洲研究与美国国家安全、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在此次讨论会上,布鲁斯·卡明

思(Bruce Cumings)提交了《界壁位移:冷战期间及冷战后的地区研究和国际研究》一文,详细阐述了“国家—情报机构—基金会轴心”在地区研究,尤其是中国研究的作用,认为影响非西方地区研究的最终力量是经济和政治权力。其他学者亦围绕此命题进行论述,他们或以亲身经历驳斥其研究是为冷战意识形态服务;或从亚洲研究的学术发展史角度论述美国的亚洲研究与国家安全有着紧密的联系;或以亚洲研究学会和国家安全教育项目为例,论证亚洲研究到底是一门学术还是小报式的新闻报道。^[16]

1993年,《立场》刊载了两篇对二战后美国中国研究与冷战意识形态关系进行犀利批判的长文:唐尼·巴洛(Tani E. Barlow)的《战后中国研究:殖民主义的职业》、冯珠娣(Judith B. Farquhar)与何伟亚(James L. Hevia)合写的《文化与战后美国的中国历史学》。唐尼·巴洛以马里恩·列维(Marion J. Levy)、卢西恩·派伊、费正清等二战后知名中国学家为例,详细论述了战后美国中国学家是如何应用其研究为冷战意识形态服务,认为战后美国中国研究实际上已沦为一种殖民主义者的职业,带有浓厚意识形态阴影。冯珠娣与何伟亚的论文,从“文化”视角对费正清、施坚雅、孔飞力、魏斐德、周锡瑞(Joseph Escherick)等人的中国历史研究进行检讨,认为战后美国中国历史研究存在一种倾向:文化被看成整个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活层面,研究者试图将复杂多样的政治结构简化为单一的“文化”形态;由此,文化实际上成为阻碍相互交流和恰当的文化理解的问题,成为学术进步的障碍。作者主张,在文化概念的使用上应当将它从思想和价值的领域解脱出来,重新放置于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性和混杂性之中。

国内学术界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开始对美国中国研究动态进行跟踪介绍。^[17]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学术传统并未延续,致使在相当长时期里国内对国外学术界的研究动态非常陌生。随着“文革”的结束,这一状态逐渐结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以来,为适应国内学术界了解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状况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的需要,部分学者开始着手调查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人员、课题、著作等基本情况。北大历史资料室编的《十年来美国对中国历史研究,1960—1971》(载《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动态》第三册,1973年)即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该文就这十年间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机构、项目、成果等进行了对当时而言非常可贵的调查和介绍;孙越生主编的《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则对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机构、图书馆、期刊等进行系统而简洁的整理。这些成果虽是资料汇编性质,但它们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者开始有选择性地翻译介绍国外学者分析二战以来美国中国学的论著。其中,代表性的译介文章有:张惠才翻译的日本学者国分良成的《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载《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期),该文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现代中国研究”40年的发展历史作了纲领性的介绍。作者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美国现代中国研究划分为战后的冷战和中国研究的起步、扩大和兴盛期的中国研究、反省期的中国研究三个阶段,对每一阶段的研究倾向、背景、分析框架、争论焦点、情报来源和资料进行了扼要的介绍。李向前翻译的美国学者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的《美国当代中国学的演变与展望》(载《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6期,1995年第1、2、3期),该文就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美国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进行了探讨。作者以10年为一个阶段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对每个阶段的研究背景、发展演变、美国中国学家在学术界和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每一阶段的成就和缺陷进行概括性介绍。其中,在谈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中国学时,作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开端,其研究成果流于表面和肤浅;70年代是其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特征是思想骚动不安和队伍的迅速扩大,研究在不断地走向成熟,但中国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不理想。卢明华翻译的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评美国的现代中国思想研究》(载《国外近代史研究》第10辑),从现代中国思想、西方思想、中国传统思想三者间关系这一独特视角,对二战以来美国关于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状况、成果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论文。^[18]

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还就美国中国学的相关问题展开分析。大体上,国内学者对于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总体概况。孙越生在《美国中国学手册》的前言,对美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提纲挈领的介绍。他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中国学分为草创时期、独立时期、发展时期(二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和跃进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重点对跃进时期美国中国学发展的政治动力、经济动力、方针、措施及成果作了简要分析。李世洞在《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上发表了《战后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一文,该文将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中国研究分为战后的徘徊阶段(20世纪50年代)和迅速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他对这两个阶段内的美国中国学内容、特点、成果进行了概括式的介绍。周晓虹的《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3期)一文,主要

介绍了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缘起、发展动力、主要阶段以及当代中国研究的现状,他认为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始于1949年之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奠基时期,而70年代则是其确立时期;从1949年至1978年这三十年时间里,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动力在于冷战意识形态。其他还有王建平、薛荔的《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载《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2期)、任蕾的《50年来美国对中国的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等论文亦对二战以来直至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中国研究作了总括性的介绍。

二是著名中国学家及其著述。费正清、鲍大可、列文森、施坚雅、史华慈、孔飞力等中国学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国学界的中坚力量。对于这些著名中国学家的研究及其著述,国内学术界颇为关注。以费正清研究为例,国内学者发表了大量评论、分析费正清研究中国的思想渊源、中国史观及其对美国中国学之贡献等论文^[19]。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仅以美国著名中国学家为博士论文选题的就有:杨华的《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列文森的中国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刘招成的《施坚雅模式研究——美国中国学社会科学化的一个剖析》(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李增田的《鲍大可及其中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龚咏梅的《脱胎换骨的近代中国——孔飞力和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学术论文有陈建华的《雷文森与儒家中国的现代命运》(《复旦学报》1997年第4期)、龙登高的《施坚雅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陈君静的《拉铁摩尔和他的中国问题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任放的《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等。值得一提的是,朱政惠先生根据史华慈学术档案资料编著了《史华慈学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一书,该书翔实再现了史华慈一生的学术活动,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透视中美对峙时期哈佛大学乃至美国中国研究活动状况的窗口。

三是基金会与中国研究发展的关系。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与洛克菲勒、福特等基金会有着密切关系,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1983年,林永侯在《社会科学》上发表了《美国福特基金会与中国学的研究》一文,专门剖析了福特基金会大力资助美国中国学的原因、目的、措施及其成效,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国研究的迅速发展得益于福特基金会的大力资助,福特基金会资助中国研究是基于服务美国政府、服务国家安全的目的;资中筠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美国研究》1996年第1期),其中有一篇章专门介绍洛克菲勒基

金会在推动美国中国学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韩铁的《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美国学》,建立于福特基金会的档案资料基础上,详细论述了1950年至1979年期间福特基金会在推动美国中国学发展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所起的作用。韩铁强调,福特基金会资助中国研究深受冷战和学界利益的影响,但福特基金会并未完全受政府和学术界的指挥,它远远超越了“国家安全”和“学界圈地”的狭隘性,福特基金会资助中国研究的行动只能用“文化主导”论才能加以解释。

四是研究范式的转变。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美国研究出现了柯文所说的从“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的转变。对于这一转变,国内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张铠的《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观”——当代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1期),在简介了以费正清和列文森为代表的中国史研究之后,作者论述了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中国史研究所出现的注重地方史、注重中国社会内部长期发展进程、注重宏观空间区域间差异的发展趋势,即从“西方中心论”向“中国中心观”的跨越。仇华飞的《从“冲击—反应”到“中国中心观”看美国汉学研究模式的嬗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主要评述了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反应”论和以柯文为代表的“中国中心观”这两种理论体系,认为它们从不同角度来认识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都各具重要参考价值,也各有失之偏颇之处。杨念群的《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认为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主要框架之一,这种框架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研究带有相当强烈的对策性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60年代初美国中国学界开始出现了试图摆脱这种对策性思维定式的迹象,出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型“地方史”研究的浪潮。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兴起逐渐扬弃了费正清刻意观照中西碰撞下的宏大事件的叙事传统,除个别学者如施坚雅尚提出了“经济区系理论”这样准宏观的解释框架外,美国中国学逐步转向了“区域研究”的中层分析。

当然,国内学者对这一时期美国中国研究的其他问题亦作了初步介绍和研究。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探讨了美国中国研究形态的分化问题,即美国中国研究如何从传统汉学转为现代中国学,并就美国现代中国学的研究取向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美国现代中国学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中主要标准之一就是1925年太平洋学会的成立,终点则是1941年“远东协会”的建立;仇华飞的《麦卡锡主义与美国中国学研究》(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探讨了麦卡锡主义对美国中国学的影